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N 1009-2463,CN 34-1195/C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作者： 罗诚，胡伟斌，鄢贞
DOI： 10.19747/j.cnki.1009-2463.2026.01.004
收稿日期： 2025-08-07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4-07
引用格式： 罗诚，胡伟斌，鄢贞. 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J/OL].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9747/j.cnki.1009-2463.2026.01.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罗 诚^{1,2}, 胡伟斌^{1,2}, 鄢 贞^{1,2}

(1.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数字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刻重塑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 数字化改革不仅是对数字时代的积极响应, 更成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然而, 当前关于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尚不清晰。研究表明, 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在内涵上契合、在路径上相通、在价值上统一, 能够通过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重塑人力资本新价值、完善公共服务新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新效能以及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 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此, 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深化乡村数字治理、持续打造数字社会三个维度, 提出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 数字化改革;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辩证关系; 作用机理; 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 (2026)01-0040-12

DOI: 10.19747/j.cnki.1009-2463.2026.01.004

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文明长期形成的价值诉求, 既延续了数千年的社会理想,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守与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并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 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尽管我国已打赢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 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当前低收入群体仍以农民为主, 发展短板与薄弱环节依然集中在农村地区^[2]。2021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 “促进共同富裕,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3]8}。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需要经济社会各领域协同发力, 并依赖技术创新、制度改革的协同配套与有效衔接。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彻底重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治理模式, 为我国迈向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时代机遇。党的十九大以来, 国家相继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等一系列顶层规划, 这意味着数字技术所蕴含的颠覆性潜能早已获得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2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4]。2022 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明确提出“数字化改革”概念, 强调“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5]。2023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纲要》, 从顶层设计层面, 自上而下系统部署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 成为数字时代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标志着数字化被提升至更为关键的战略位置。当前, 以数字化改革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变革, 助力应对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挑战, 已成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6]18}。

收稿日期: 2025-08-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式农民现代化与农民发展理论创新研究”(2024JZDZ06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重冲击与韧性食物系统研究”(22JJD790079)

作者简介: 罗 诚(1999—), 男, 四川宜宾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伟斌(1980—), 男, 浙江衢州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 硕士生导师。

通信作者: 鄢 贞(1982—), 女, 浙江衢州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数字化改革作为公共治理领域的重要实践创新,是数字时代背景下对生产方式自我优化的主动适应,更是对技术、规则和组织制度进行改革以迎合数字技术系统的自觉重塑^[7]。相关文献主要围绕数字技术在产业经济^[8]、政府治理^{[9][13]}、公共服务^[10]等领域的应用展开研究,并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数字技术具有均衡共享特性,不仅能够发挥“做大蛋糕”的财富创造效应,还能实现“分好蛋糕”的普惠共享效应,从而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提升,实现共同富裕^{[11-12][13]48}。在此基础上,学界进一步探讨了数字化改革的重大意义^[14]、路径选择^{[15]13}、治理模式重塑^[16]以及与共同富裕进程的制度协同^{[17]10},为理解数字化改革的共富效应奠定了理论基础。

虽然现有研究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效益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理成果,但对于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在辩证关系与作用机理仍缺乏系统阐释。为此,拟在界定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梳理两者契合共生、互为支撑的辩证关系,重点揭示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提出实现路径。

一、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与辩证关系

(一) 数字化改革的内涵

数字化改革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实践的长期积累。分析数字化改革的实践脉络,可以看出这类改革大多遵循一个较为清晰的演进逻辑:一方面,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主体会先行建设“城市大脑”“产业大脑”“政务服务平台”等基础性数字设施,为后续解决现实问题奠定底层支撑;另一方面,改革往往从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一些“关键小事”切入,在具体应用场景中推动数据整合和流程再造;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会逐步完善,比如公共数据条例、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为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安全使用提供制度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进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技术应用、数据驱动、流程再造、制度调整与治理理念变革交织互动、不断迭代的动态过程。从理论视角看,刘渊将其视为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为手段,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升级的治理革新^[18]。在这一过程中,数据被视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应用作为主要载体,不仅赋能经济社会变革,同时也推动数字领域自身的制度创新与治理重塑。也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其本质是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国家、省域、市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过程,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19]391}。

数字化改革不同于以往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应用赋能,而是一场涵盖内容、领域和价值三个方面的全面深化与突破重塑。从核心内容看,数字化改革不仅从技术层面赋能政府组织转型、产业经济变革、社会治理提升,而且包含制度层面的再造和认知层面的突破,实现从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向制度理性、价值理性的跨越^[20]。对于领域应用,数字化改革从关注政府、产业等片面、单一领域,渐进地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多领域贯通延伸,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9]136}。在价值取向上,数字化改革旨在牵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跃升,既体现在微观层面对行业、部门与领域的效能提升与价值创造,也体现于宏观层面数字技术赋能、数字规则制订与数字红利共享,逐步成为引领数字文明建设与全球数字变革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高地,为国家发展谋长远之利,为人民生活谋普遍之福^{[6]22}。

综上所述,数字化改革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支撑,在数字化应用中革新治理制度、重塑数字思维,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生产力进步与生产关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质效提升的社会变革。与“数字化”“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等相关概念相比,数字化改革在内涵和层级上都有更突出的特征,可以被视为一种更独特、更高阶的表述。一般来说,数字化可以理解作为一种表现形式,数字技术是实现数字化的具体工具,数字经济则是其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和成果。对于数字化改革,其关注点不仅仅限于技术和产业层面,还在于更全面的制度与治理层面的深刻变革。如果从特征上加以概括,可以发现:第一,数字化改革追求的是系统优化而非局部改进。它并不是单个行业或部门的升级改造,而是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整体协同。如果不打破层层数据壁垒,则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智治^[21]。第二,数字化改革强调制度的再造,而不是技术叠加。技术本身并非最难的部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牵引体制机制改革,从而在组织架构、管理流程、法规标准乃至监管方式上实现深度优化。第三,这种改革还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取向,而非工具理性导向。换言之,其目标不仅着眼于效率提升,更关乎社会公平、普惠性和可持续发展,最终旨在增进全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

学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视角进行阐释。从政治视角看,共同富裕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契约,它在实现国强民富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契约主要出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而有限分享发展成果^[22]相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更具有人民性。从经济视角看,共同富裕的实现依托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内涵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富裕,也涵盖精神层面的充盈。物质富裕决定精神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础,且随着物质文明不断丰富,高质量的精神文明日益成为必然需求^[23]。因此,人民共享物质与精神财富,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正是共同富裕理念下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集中体现。从社会视角看,共同富裕不仅要求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更强调提升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并为不同群体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合理的向上流动通道^[24]。总体来说,共同富裕既不同于“均贫富”,也不能重走“大锅饭”的老路,而是要坚持“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渐进富裕、共建富裕”的发展路径^[25],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包含共同富裕的一般性质,也具有其特殊的一面^[26]。从一般性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目标的进展与实现,其最终目标同样指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实现过程也必须遵循阶段性、渐进性、非同步性与非均衡性规律,价值取向亦强调保障机会均等以缩小不合理差距^[27]。从特殊性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明确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空间范围,其内涵不仅包括农民个体生活的富裕富足,也涵盖农村地区的整体宜居宜业;其核心诉求是推动农村居民在发展权利和机会上与城市居民均等,并切实缩小城乡、区域与群体间的不合理差距^[28]。基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内涵分解为农民共同富裕和农村共同富裕两部分,前者强调的是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富裕富足,后者强调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雄厚、农村产业高质高效和乡村宜居宜业^[29]。也有部分研究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农村居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公平的参与机会与发展条件,以及有差异但又可比拟的收入消费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30]。但总的来说,各方观点均一致指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农业农村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基础上,否则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1]。

结合上述理论视角与我国农民农村的现实情境,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以农业生产力持续提升为前提、以农民稳定增收为目标。这要求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农村制度改革和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激发农村市场活力,促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以及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富裕。第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以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促进农村社会公平为核心,推动农民在各领域普遍受益。这意味着要不断缩小城乡、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确保全体农民能够平等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在此过程中普遍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实现在高水平协调发展中共建共富。第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安排为保障,通过持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和乡村治理机制,促进城乡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保障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民生领域的权益,构建有利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体系,从而在高效能治理中促进共创共享。

(三)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

首先,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相契合。数字化改革主要通过治理制度革新与体制机制贯通协同推进,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与资源统筹配置。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则依赖于与时俱进且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有限资源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26]14}。两者均强调全方位、系统性的治理架构设计,旨在提升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在目标上,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广泛交集,二者共同聚焦于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等多个方面,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同发展^[32]。数字化改革涵盖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政府、培育数字社会、营造数字生态,以及共享数字红利等诸多维度,高度契合共同富裕愿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33]。从路径特征看,数字化改革注重系统性优化、持续性迭代,其演进逻辑与共同富裕所强调的全面、渐进、动态特征具有内在一致性^{[15]21}。在数字化全面赋能社会经济背景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积累速度得以稳步提升,为共同富裕的思想认知、理论深化、价值追求与目标实现提供了新的养分和根本动力^[34]。总体而言,在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宏伟目标上,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具有深刻的逻辑契合性。

其次,数字化改革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路径。数字化改革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数字化改革通过制度层面的适应性调整释放并强化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在此基础上,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依托数字赋能推动农村产权、要素市场、公共服务与乡村治理等关键制度的集成化、精准化和前瞻性设计,进而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渐进式实现^{[13]56}。数字化本身所具有的广泛覆盖、深度渗透和普惠共享等特性,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桥”和“路”^[35]。在数字化驱动的深刻变革中,改革进一步开拓治理空间、激活发展动力,在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优化制度以促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以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符合数字时代发展规律和特点的适应性调整^[36]。这不仅体现在数据产权与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宏观制度层面,也延伸至更具操作性的治理实践中。在治理实践方面,数字化改革通过整合数据要素与数智技术,实现对舆情动向的动态监测与精准研判,从而全面把握农民需求、强化舆论引导,提升政策制定与调整的及时性与针对性,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凝聚思想共识^[37]。同时,数字化改革还有助于精准识别不同收入水平与发展层次的农民群体,采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包容普惠发展策略,有效应对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挑战,为数字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提供路径选择^{[17]12}。

最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数字化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蕴含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3]4}。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又一重大发展目标,它承载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使命,旨在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在这一进程中,数字化改革正经历着从工具理性向制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转型:不再仅仅作为技术赋能的手段,而是日益成为支撑制度重塑、推动社会共享的重要力量^{[6]22}。通过治理制度和体制机制的质量、效率与动力三重变革,数字化改革打破党政、部门、领域层级之间的界限壁垒,推动资源实现更高效、更广泛的配置,显著降低社会运行与交易成本,精准回应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多元诉求^{[19]391}。进一步地,通过共建、共富、共享的实践路径,逐步推动全民共同富裕,支撑起人口规模空前的农民与农村现代化进程,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38]。由此可见,数字化改革与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的共同富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展现出共同的内在价值。换言之,站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转型和文明形态更迭的历史交汇点上,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正是数字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与深层次价值追求。

二、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时代引领经济社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其通过培育新的发展优势,为加快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路径。基于数字经济、数字政府与数字社会等领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积累,从产业发展、人力资本、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以及城乡融合五个维度,系统探讨数字化改革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并提炼其潜在影响路径(见图1)。

(一) 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 夯实共同富裕物质根基

产业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从新结构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视角看, 单一的技术变革很难支撑长期可持续发展, 必须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前提, 才能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39-40]。因此, 数字化改革的价值远不止于推动产业数字化或数字产业化, 它更强调制度与技术的相互配合, 以此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并确保农民在新业态和新模式中真正分享到发展成果。其与一般“数字化应用”的明显区别是: 后者通常过于聚焦效率, 而忽视了城乡差距、群体差异引发的数字鸿沟^[41]; 前者则寻求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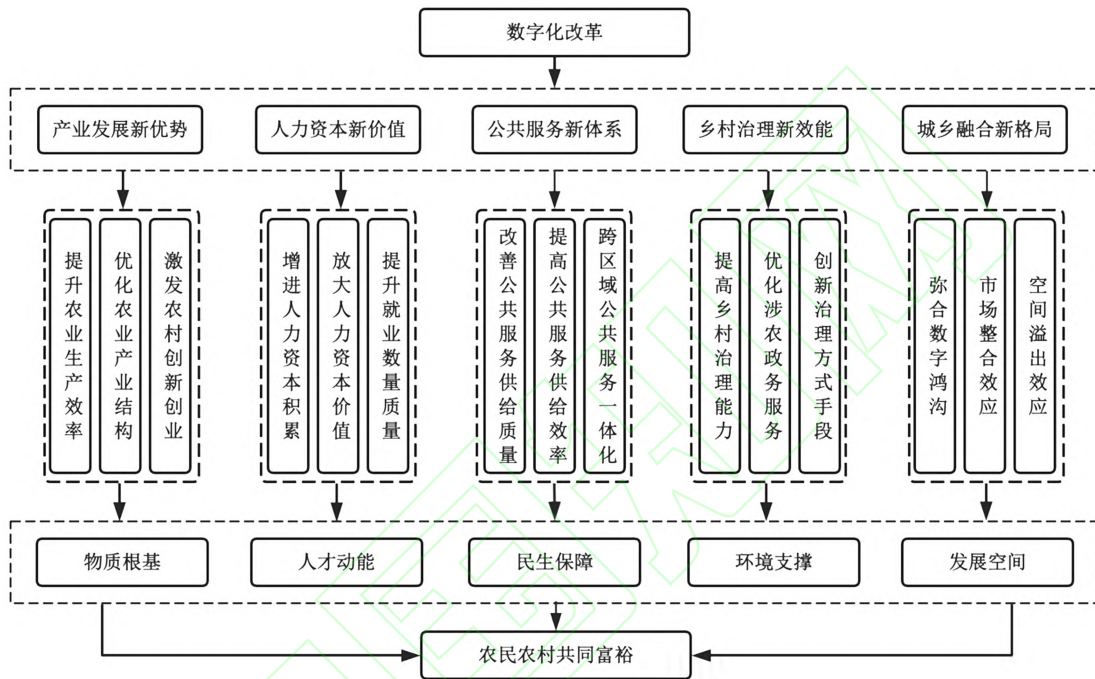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化改革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在农业生产效率方面, 数字化改革并非简单地在农业领域引入数字技术, 而是将技术与制度同时嵌入产业链, 兼顾“效率提升”与“公平共享”。一方面, 统一的数据平台和规则体系让产业链条上的数据能够更顺畅地流通和共享, 减少不同环节与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 显著提升上下游各环节的协同效率与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 有效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确保涉农互联网平台规范运行, 更通过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 防止农民在自发的市场环境下被边缘化, 确保产业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数字红利”广泛共享。

从农业产业结构角度看, 数字化改革不仅涉及农业资源要素的数字化, 更强调资源要素在制度引导下的高效流动以及跨区域配置, 进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借助数字农业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 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 价值链逐步升级。在这一过程中, 传统农业逐渐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同时通过资源的制度性再配置, 产业结构也朝着更高级、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对于农村创新创业活动, 数字化改革以制度化的政策支持和平台规范, 为中小微农业企业和农户营造相对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比如, 统一的准入制度、数据产权保护和数字化的创业服务, 降低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创新创业的门槛和风险。农民不仅能依靠平台技术从事定制化、个性化生产, 还能在制度保护下获得较为稳定的收益份额。这种机制的建立, 逐渐加快了农村创新创业生态的形成与壮大。

(二) 重塑人力资本新价值, 汇聚共同富裕人才动能

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民能力的提升既关乎个人致富, 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按照人力

资本理论^[42],教育和技能培训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长期的收入增长。但是,数字技术扩散效应的研究也指出,新技术能否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学习与适应能力^[43]。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不能仅仅依赖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创新,让技术赋能最终转化为具备普惠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人力资本积累与价值实现机制。

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数字化应用能够通过远程教育或在线医疗,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知识学习与健康保障服务。但这些应用往往受到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和商业供给逐利的现实约束,从而造成地区、群体之间在数字服务获取与利用效果上的不平等。而数字化改革更强调制度嵌入,将数字教育和智慧医疗纳入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例如,各级政府在“互联网+教育”^[44]和“智慧医疗”^[45]等方面加大财政投入,推动优质资源跨区域共享。这一制度性安排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与健康水平,还能保障边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从而实现更具普惠性的资本积累。

在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上,数字化改革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数字平台本身具有技能传播和供需匹配的潜力,但如果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这种潜力难以充分释放。通过改革,构建统一的职业培训平台与技能评价体系,辅以大数据驱动的劳动力对接机制,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就能被更好地识别和使用。也就是说,农民的知识与技能不再局限于本地农业,还能跨区域流动或者与更高端的产业需求相匹配,从而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持续放大^[46]。

在就业数量和质量提升方面,数字化与产业的结合本身创造了新岗位,如电商直播、线上客服、数据标注等,但这些岗位往往存在稳定性不足、上升空间有限等问题。数字化改革通过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完善数字劳动监管制度、推动城乡就业服务一体化,为农民提供了更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新业态所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不仅大于替代效应,而且还促进了更高质量的就业,为农民提供长期的发展机会^[47]。

(三)完善公共服务新体系,提升共同富裕民生保障

公共服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观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既带有一定的排他性,又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往往很难实现有效供给^[48],需要政府通过制度安排保障其普惠性与公平性。进入数字化时代,尽管技术能够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但缺乏制度引导可能会拉大城乡、群体差距,造成新的“数字鸿沟”。数字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制度重塑和政策创新,把数字化工具嵌入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普惠性的服务格局,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更稳固的民生保障。

从公共服务质量看,数字化改革通过建立统一的线上公共服务平台和跨部门协同机制,使原本分散的服务流程实现标准化和集约化。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公共资源不再被浪费在重复投入或部门间的推诿扯皮上,而是更直接地惠及农村居民。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的推广不再停留在地方性试点,而是通过顶层设计纳入政府职能和财政保障。与单纯的数字化应用相比,这一改革使数字服务逐渐从短期项目走向普遍性供给,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权利。

在公共服务效率层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为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创造了条件。但如果缺乏跨部门的数据协同和制度支撑,这些技术往往难以发挥最大作用。数字化改革则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和服务标准化机制,重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得以实时掌握农村人口结构、健康信息和就业情况,从而动态调整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这意味着服务不仅更精准高效,也减少了传统公共服务的重复、冗余与低效,实现制度层面的效率提升。

从跨区域公共服务看,单纯的数字技术手段很容易受制于行政区划或地方利益,难以实现公共服务的跨界流动,而数字化改革着眼于打破行政条块分割与区域壁垒,通过构建跨区域的信息共享与资源联动机制,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系统性支撑。以“四川云教”工程为例,该工程不仅构建了覆盖全学段的远程教育协作联盟,更通过配套的组织管理、政策支持与激励考核机制,将优质学校的课程与教研资源制度化、常态化输送至薄弱学校,从而在省域范围内实现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共享与质量均等,切实保障不同区域、城乡学生享有

同质同权的教育机会^[49]。

(四) 提升乡村治理新效能, 筑牢共同富裕环境支撑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是农民和农村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制度保障。传统乡村基层治理更多依赖科层制管理和村干部个人经验, 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的制约下, 容易出现行政效率低、资源分配失衡乃至基层腐败现象^[50]。以信息管理系统、视频监控设备为典型代表的数字赋能,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 但由于缺乏制度配套, 往往形成“数据孤岛”, 难以有效发挥协同作用^[51]。数字化改革则通过制度和规则的重塑, 把数字技术全面嵌入治理体系, 从而推动治理方式的整体转型与效能提升, 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营造更加公平、和谐和高效的社会环境。

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方面, 传统治理依赖线下、单一主体和经验性处理^[52], 而数字化改革驱动下的治理逐渐向线上线下结合、多元互动和数据驱动的方向演进。一体化的乡村治理平台让村民、村干部、乡贤等多元主体都能在线表达意见、监督事务, 使信息不对称显著下降。这一治理方式的转变不仅提高了透明度和决策科学性, 也增强了村民的参与感。例如, “互联网+基层治理”改革, 就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把数据采集、反馈和协同决策纳入统一体系, 使乡村治理摆脱对个别干部经验的依赖, 并依托平台实现持续优化^[53]。

在涉农政务服务优化方面, 过去的乡村治理存在明显的条块分割与信息壁垒, 上级政府、村集体和农民之间沟通不畅, 效率低下, 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难以得到监督^[54]。数字化改革通过一体化政务信息平台推动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实现材料电子化、业务线上化、流程标准化。这种做法既减少了农民办事的成本与时间, 也通过透明化的制度设计有效遏制了权力滥用, 从而营造出更加公平的营商和发展环境。

在创新治理方式和手段方面, 数字化改革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入常态化运行机制, 构建集数据采集、分析预警与处置反馈于一体的治理闭环, 推动基层治理逐步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例如, 惠农资金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全链条透明化监管, 防止虚报冒领与权力寻租^[55]; 农民信用体系和积分制治理逐渐推广, 引导村民自我约束和主动参与^[56]。这些制度安排既丰富了治理的工具, 也利用制度设计让技术功能转化为持久的治理效能。

(五) 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 拓展共同富裕发展空间

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民和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发展深受二元结构制约, 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割裂流动和区域差距明显^[57]。新经济地理学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均指出, 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在于打破要素流动的壁垒, 发挥中心地区的扩散效应, 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58-59]。

在这一背景下, 数字化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与顶层统筹, 把数字技术嵌入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框架, 从而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市场整合、释放空间溢出效应, 推动城乡关系逐步走向深度融合。

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 数字化改革一方面通过制度性投入持续扩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覆盖的广度与深度, 另一方面也重视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60]。缩小数字鸿沟不仅依赖于网络与硬件的广泛接入, 更在于农民是否具有数字素养, 能否掌握与之匹配的技能。因此, 除宽带普及、移动通信设施优化外, 改革还推动建设统一的数字素养提升平台, 让培训成为常态化、制度化的公共服务。从接入到赋能的转变, 有效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从“能用”走向“会用”“好用”, 为城乡要素流动奠定基础。

在市场整合方面, 数字化改革推动了城乡资源要素在统一制度框架下的优化配置^[61]。数字技术虽为城乡供需搭建了高效的对接平台, 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 但若缺乏配套的制度约束, 仍可能导致平台垄断、交易不公等问题, 既损害农民利益, 也阻碍要素自由流动。数字化改革通过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规范平台交易规则, 构建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此类制度性安排, 有助于打破城乡流动壁垒, 推动农村资源对接城市市场和城市要素下沉乡村, 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从而让农民也能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助力城乡市场深度融合。

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数字化改革通过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推动知识、技术与信息的持续扩散^[62]。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经常受制于行政边界与利益格局^[63],而制度创新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建立跨区域协调与统一规则,有效打破行政壁垒、化解区域利益分歧。在此基础上,跨区域产业协作、要素共享与信息互联,为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技术与创新资源向边缘地区和农村扩散提供了可行路径。举例来说,跨区域农业产业平台不仅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链合作互补^[64]。这种由制度保障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三、数字化改革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数字化改革不仅仅是把数字技术简单引入农村,更是通过制度创新、规则重塑和顶层设计,将数字逻辑与制度逻辑深度结合,并嵌入农业产业、人力资本、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和城乡融合等重要领域,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从理论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公共物品与福利经济学、治理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理性框架,为数字化改革的赋能机理提供了有力支撑。这表明,数字化改革并非一项孤立、局部的政策工具,而是一种系统性、全局性的变革,能通过提升农业生产率、积累并放大人力资本、提高公共服务质效、增强治理效能和促进城乡要素融合等多维路径,共同加快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与单一的数字赋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经济相比,数字化改革的突出特征在于其系统性与制度性,不仅突破了城乡二元割裂和部门壁垒,还通过制度安排保障了数字红利的公平分配与普惠共享。正是这种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变革力量^{[17]10}。

(一)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

推进农业产业与乡村发展的数字化改革,不仅依赖数字技术的引入与应用,而且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规则重塑,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和农村创新创业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制度环境。只有将数字逻辑与制度逻辑深度嵌入农业与乡村发展全过程,才能避免数字红利仅惠及少数群体。为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健全数字基建与制度化运维体系,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首先,数字基建是生产效率稳定提升的基础性支撑^[65]。应建立城乡统筹的数字基建投入机制,探索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多元投入模式,并通过数字基建运营与维护的制度化安排,为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长期支持。其次,由政府或科研机构主导,建设“田块—区域”一体化的公共数据中枢,采集田块级气象、土壤、投入品、产量等数据,明确数据权属与共享机制,打通县级、市级和省级等层面的农业数据中枢,促进跨区域、跨部门的互联互通。最后,打造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农事综合服务,为包括小农户在内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集成式服务。

二是因地制宜建设产业大脑与公共交易平台,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先,依托各地特色产业和资源禀赋,在区域层面建设统一的产业大脑,将数据中枢与电商平台、批发市场、加工企业对接,实现产销信息匹配、订单式生产与产地价格发现,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次,重点支持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以园区为试点单位,建设集物联网传感器、大数据平台、云计算中心为一体的智慧农业园区,试点并推广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园区经验。最后,加快建立农业数据要素市场与公平交易规则。根据地方实际,成立区域数据交易试点,探索农业数据定价、交易与结算机制,明确数据共享的收益分配规则,并注重保障小农户权益。

三是构建农村创业数字化综合服务体系,鼓励农村创新创业。首先,依托数字平台提供线上辅导、项目申报指引、补贴申领流程说明以及常用合同范本等,加快线上审批与结果落地,降低创业人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创业服务可及性。其次,针对农业创业融资难等问题,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与创业融资支持机制。可通过合作社、电商平台的经营数据建立创业信用档案,推动基于经营数据的快速贷款、线上信用担保与风险补偿机制,提高创业者的融资可得性。最后,拓宽市场渠道并完善平台治理。鼓励

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加强协调,引导电商平台制定市场准入与质量标准,开展品牌推广与数字营销培训;同时,制定电商平台与农村商户之间的公平交易规则,防止平台滥用定价权与数据垄断。

(二)深化乡村数字治理,以高效能治理助力共同富裕

数字化改革的重点不是将政务事项简单搬到线上,而是通过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将数字逻辑与制度逻辑深度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实践。只有通过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政务服务的流程优化以及治理工具的数字化创新,才能使乡村数字化治理真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支撑力量。

首先,提升治理能力。第一,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单靠技术难以打破信息“孤岛”,需要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汇聚和共享机制,明确数据标准、权责分工和安全边界。这样才能把分散在农业、土地、人口、信用等领域的基础数据整合、归集起来,为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数据支撑。第二,推广“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治理。通过跨部门流程的系统性再造,将审批、监管、服务等事项统一纳入数字化平台管理,形成一套高效协同的治理链条,精简重复事务工作、减轻基层行政负担,使基层干部从事务性操作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在公共服务和治理创新上。第三,构建数据驱动的绩效与风险管理机制。在数据共享与数字化平台管理的基础上,完善权责清单、绩效考核与风险预警等制度安排,形成以数据为核心支撑的治理闭环,实现治理过程的动态监督与自动纠偏,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其次,优化政务服务。第一,推动涉农事项“一网通办”。聚焦农民的实际需求,建立统一的服务入口,把农资补贴、社会保障、土地流转、农资供应等高频事项纳入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事项集中、流程透明和一次办结。第二,健全数字化信息公开制度。在线上公开涉农政策、惠民补贴等,确保农民能够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得到制度保障。第三,推动精准化服务供给。依托数据整合与信息共享成果,绘制包含个人信用、能力禀赋、发展需求等多维信息的农户画像,推动涉农政务服务从“普惠型”向“个性化”转变,从而实现政策的精准匹配与高效落地。

最后,创新治理工具。一方面,推广数字化自治制度,创新制度载体。建立涵盖村民公共事务、环境保护、志愿服务等方面行为记录的数字积分与信用档案,并将其与集体资源分配、荣誉评定挂钩,以此激发村民由“被动接受治理”向“主动参与建设”的角色转变。另一方面,完善数智治理工具的应用机制。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视频监控、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生态环境检测、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治理场景,推动技术工具由项目化、阶段性应用转变为常态化、体系化治理手段。

(三)持续打造数字社会,以高品质生活助力共同富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质量的需求。数字社会建设的重点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和规则创新,把公共服务体系数字化、制度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有机会、有能力、长期稳定地享受到均等化的服务与更高品质的生活。在实践层面,可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首先,推动公共服务普惠化。一是建立覆盖城乡的一体化数字公共服务平台,把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就业等纳入统一的制度框架,实现“一网通享”。二是完善跨区域资源调配机制,通过数据驱动和制度约束,推动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跨区域合理配置,打破城乡与地域界限,缓解农村公共资源长期供给不足压力。三是健全制度化公开与监督机制,把补贴发放、社保待遇、医疗结算等公共事务纳入数字化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知情权和监督权,让普惠性服务真正公开透明。

其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是实施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建设,在宽带、5G及公共数据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行一体规划、空间联动,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倾斜,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确保农民在家门口能享受到与城市同等质量的数字产品服务。二是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化安排,以制度规则重塑城乡要素流动秩序,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土地、资金和数据要素流转平台。三是促进城乡文化与消费融合,把城市数字消费场景与文化资源延伸至农村,培育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差距。

最后,提高农民与村干部数字素养。数字素养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民融入数字社会的程度和能力。一是常态化开展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培训既面向农民,帮助其掌握智能手机与各类数字化平台的使用技能;也面向村干部,提升其数字技术认知与应用能力,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二是推动信息无障碍制度建设,为老年、残障等群体制定无障碍服务规范,简化智能应用操作,推广智能语音助手。三是建立数字素养考核机制。一方面,在村干部培训中突出数字治理能力培训,将数字素养作为干部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将数字治理表现纳入日常考核,从而形成数字素养长效提升机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2] 黄祖辉,叶海键,胡伟斌. 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题与破解[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6):2-11,126.
- [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4-8.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 人民日报, 2021-03-13(1).
- [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强调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EB/OL]. (2022-04-19)[2025-10-01]. https://www.qstheory.cn/yaowen/2022-04/19/c_1128575438.htm.
- [6] 陈畴镛. 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与推进机理[J]. 治理研究, 2022, 38(4):18-26,123-124.
- [7] 黄璜. 对数字化改革与转型的思考[J]. 中国信息界, 2021(2):52-53.
- [8] 马述忠,贺歌,郭继文. 数字农业的福利效应:基于价值再创造与再分配视角的解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5):10-26.
- [9] 郁建兴,周幸钰. 数字技术应用与政府创新的双向互构:基于浙江省“三张清单”数字化改革的分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1):133-143.
- [10] 史新杰,崔柳,傅昌鑫. 数字技术助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机理与实践逻辑[J]. 治理研究, 2023, 39(2):109-123,159-160.
- [11] 王邵军.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23(11):21-36.
- [12] 周亚虹,邱子迅,姜帅帅,等.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电子商务与数字金融协同视角[J]. 经济研究, 2024, 59(7):54-71.
- [13] 王娜,孔雅茹. 数字技术何以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思考[J]. 财经科学, 2025(7):48-59.
- [14] 景跃进. 数字时代的中国场景:数字化改革的政治意义[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1):38-42.
- [15] 张日波,钱姝凡. 数字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一个内生公共物品的超边际分析框架[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7):13-22, 68,156.
- [16] 郁建兴,周幸钰. 超越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中的治理模式重塑何以可能[J]. 学术月刊, 2023, 55(11):73-83.
- [17] 赵永帅. 数字化改革与共同富裕的制度协同[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10-17,80,168.
- [18] 刘渊. 关于数字化改革理论内涵的解读[J]. 政策瞭望, 2021(3):31-32.
- [19] 兰建平. 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实践逻辑、理论“矩阵”与路径设计[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0(4):389-396.
- [20] 袁家军. 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 努力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J]. 政策瞭望, 2021(3):4-8.
- [21] 郁建兴,黄飏. “整体智治”:公共治理创新与信息技术革命互动融合[N]. 光明日报, 2020-06-12(11).
- [22]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 37(8):117-129.
- [23]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 2021, 56(11):4-13.
- [24] 蔡昉.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N]. 经济日报, 2020-12-07(1).
- [25] 李海舰,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 改革, 2021(12):1-15.
- [26] 廖祖君,卢晨瑜.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涵特征、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 2024(2):6-16.
- [27] 李容达,王琳.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宏观经济管理, 2024(6):52-58,66.

- [28] 马晓君,王梦宇,于渊博,等.我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进特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4(2):35-51.
- [29] 唐亮,杜婵.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依据、现实挑战及实现路径[J].农村经济,2022(7):10-17.
- [30] 宋洪远,唐文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预测与实现路径[J].农村经济,2024(9):49-58.
- [31] 韩文龙,唐湘.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1):14-24.
- [32] 薛瑞汉,张乃仁.以数字化改革助推共同富裕[N].光明日报,2023-02-15(6).
- [33] 郭栋,邓雅兮,刘云.数字化改革赋能共同富裕:基于创新驱动发展视角的分析[J].社会科学家,2023(6):82-88.
- [34] 葛林羽,安同良.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研究[J].经济问题,2024(9):34-41.
- [35] 汤临佳,周晓燕.数字化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建设的影响研究[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159-166.
- [36] 郭栋,尤帅,刘云.数字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动力机制、关键主体及提升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4(2):45-51.
- [37] 周光辉,贺竞超.以“智治”破解基层社情民意工作难题:从杭州案例浅析中国数字化改革的意义与未来[J].浙江社会科学,2023(1):46-50.
- [38] 刘双双.以数字化改革助推城乡共同富裕[J].群众,2021(20):46-47.
- [39] 李玉虹,马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的理论探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J].经济科学,2001(1):87-93.
- [40]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J].学习与探索,2017(5):133-145,2.
- [41] 周慧珺,邹文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鸿沟的现状、影响与应对策略[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3):60-67.
- [42] 王明杰,郑一山.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06(8):92-95.
- [43] 王金营,杨一丹.技术扩散中人口规模和质量的作用:来自OECD的实证[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5):140-152.
- [44] 姚晓丹,张文攀.打破教育资源的跨时空传递瓶颈,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在东西部之间的互通共享:从一块屏到一片天[N].光明日报,2020-11-20(12).
- [45]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2864号提案答复[EB/OL].(2023-03-22)[2025-08-01].<https://www.nhc.gov.cn/wjw/tia/202303/029a9b33f03a46d7911c7f5cd89f12fb.shtml>.
- [46] 纪雯雯.数字经济背景下提升人力资本创新贡献力的思考[N].工人日报,2022-10-31(7).
- [47] 田鸽,张勋.数字经济、非农就业与社会分工[J].管理世界,2022,38(5):72-84,311.
- [48] 马庆钰.公共服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9(1):58-64.
- [49] 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余孝其:搭建城乡教育联盟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EB/OL].(2023-02-16)[2025-08-01].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3/2023_zt01/pxlt/pxlt_jcyj/202302/t20230216_1045191.html.
- [50] 刘守英,熊雪峰.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J].农业经济问题,2018(9):10-23.
- [51] 舒全峰,苏蕊.委托代理、不规则信息与农村医保数字治理成效[J].社会治理,2024(5):38-49.
- [52] 李三辉.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J].中州学刊,2021(3):75-81.
- [5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EB/OL].(2021-07-11)[2025-08-01].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7/11/content_5624201.htm.
- [54] 贺雪峰.村级治理的变迁、困境与出路[J].思想战线,2020,46(4):129-136.
- [55] 何清平,王婉琳.重庆推动数字技术融入监督全过程 严防惠民惠农资金跑冒滴漏[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12-29(4).
- [56] “川善治”智减基层负担 数字化赋能轻装上阵[EB/OL].(2025-06-09)[2025-08-01].<https://nynct.sc.gov.cn/nynct/c100632/2025/6/9/9ece138bb09c46159597ec0d8c6ce3dc.shtml>.
- [57] 林晨.价格管制、要素流动限制与城乡二元经济: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5):70-79.
- [58] 刘美平.论中国特色城乡协同发展理论:兼评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2):71-74,112.
- [59] 刘安国,张越,张英奎.新经济地理学扩展视角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184-190.

- [60] 赵伟,王子豪. 因数得福:数字基础设施、农民数字素养与农村共同富裕[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4, 45(5):41-51.
- [61] 王钺.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市场整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2):39-48.
- [62] 司增绰,李燕. 数字经济减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逻辑及效应[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40(4):76-86.
- [63] 曾祥炎,魏蒙蒙,梁银笛. 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理、难点与对策[J]. 东岳论丛, 2023,44(11):114-120,192.
- [64] 谭正平:粤川渝农业合作这些年:从产业协同到区域共兴的实践探索[EB/OL]. (2025-08-19)[2025-08-25]. <https://www.bcenn.com/a/202508/683606.html>.
- [65] 刘儒,郭提超,辛建岐. 新型数字基建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 财经科学, 2024(11):57-71.

Digital Reform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and in Rural Areas: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LUO Cheng^{1,2}, HU Weibin^{1,2}, YAN Zhen^{1,2}

(1.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is driving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lobally,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digital reform is not only a proactive response to the digital era,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advanc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and in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digital reform empowers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and in rural areas remain insufficiently explored. This paper shows that digital reform and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and in rural areas are consistent in essence, closely linked in practice, and unified in value orientation. Digital reform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y fostering new driver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generating new value of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ing new system of public services, thus strengthen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deepening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and advancing the building of a digital society.

Key words: digital reform;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farmers and in rural area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mechanisms; pathways